民革的民主建国之路

□孙 信

开栏语

各民主党派在探寻中华民族救亡图存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同中国共产党相遇、相识、相知，自主、自愿、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他们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全力投身抗日战争，热烈响应“五一口号”，积极开展新政协运动，努力参与筹建新中国，最终走上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学习时报开辟“民主党派与民主建国道路”专栏，回顾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历程，激励各党派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篇章。

1948年第一届民革中央部分领导人在香港的合影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由继承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革命精神的原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所创建。它从1920年代初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开始孕育，到1948年1月1日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历史性时刻正式成立，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酝酿，是一个历史悠久、成立过程相对漫长的政党，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革先辈们进行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

孕育生长 斗争中积蓄力量

民革的孕育过程，是随着我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部不断分化组合、爱国民主力量逐渐集结的过程。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以后，国民党内部分化为左、中、右三派。以宋庆龄、何香凝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持三大政策，同国民党右派以及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不懈斗争，号召一切忠于孙中山革命纲领和政策的国民党人继续坚持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进一步分化。民主派领袖宋庆龄、何香凝等揭露并谴责国民党统治集团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行径，并积极响应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动员各界同胞，抗日救国。何香凝甚至送裙子给蒋介石，并附《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诗：“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以此表达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和抗议。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纷纷以各种方式，要求国民党统治集团遵循孙中山遗志，同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日。但蒋介石的反共反民主的立场始终未变，不断制造摩擦，“皖南事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度濒临解体。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逐步认识到，要改变蒋介石独裁和对日妥协政策，必须把国民党内外的爱国民主力量组织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他们积极酝酿建立组织，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逐渐集结。

抗战胜利以后，特别是《双十协定》签订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加剧了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成立民主党派组织的紧迫性。1945年10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在重庆宣告成立。1946年4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在广州宣告成立。两者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自动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

民联、民促的成立，为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为国民党民主派同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彻底决裂、为民革的最终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创建组织 联合反对独裁统治

1946年6月，蒋介石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并在国统区残酷镇压民主运动。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民联、民促的斗争，从抗战胜利初期的维护《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争取和平民主，转到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革命胜利，公开打出反蒋的旗帜。在斗争中，它们互相支援，配合行动，产生了联合的要求。

1947年秋，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蔡廷锴等人多次集会，经过反复协商，决定组成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起草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成立宣言》《行动纲领》等文件，并进行了有关的组织准备工作。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香港举行，民革正式成立。民革在《成立宣言》中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发布行动纲领，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民革《行动纲领》规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

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历史性时刻，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共同目标下，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大联合；标志着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的基础上，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开决裂。民革的成立，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使国民党反动派陷于更加孤立的处境；民革的成立，扩大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力量，使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

秘密策反 积极配合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民革充分利用其与国民党军事人员关系密切的独特优势，积极开展军事策反工作，使一批国民党官兵先后起义投诚，为加速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灭亡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3月，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军事工作大纲》并决定即刻开展反蒋军事工作，由李济深特设秘密机构执行。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立即成立秘密军事小组，拟定行动计划，并决定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指导，配合他们开展军事策反活动。

为有效开展策反工作，李济深多次派出民革成员，让他们带着自己的亲笔信秘密联系国统区的老相识，委托他们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策反工作。1948年11月，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李济深公开发表谈话，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效法吴化文诸起义将领，为中华民族和民主革命立功，“徘徊顾虑，只有延长人民的痛苦”“真正信奉革命战争的三民主义的武装同志，是应该以曾、吴诸将领为模范，立即行动起来的”。

此外，民革还在广东、香港、湘桂、闽浙等地进行游击斗争等反蒋武装活动，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和游击队相互配合、相互策应，动摇国民党后方的反动统治。

在李济深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民革的军事策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成功策反了吴化文、王晏清、刘昌义、张轸、程潜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阵前起义，促成了北平、绥远、湖南、新疆和平解放。民革还策动了资源委员会，国民党军政人员和驻外使馆起义，从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给予国民党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瓦解。

响应“五一口号” 共建民主联合政府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迅速得到民革的积极响应和热烈拥护。

1948年8月起，民革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代表和有关民主人士在共产党的周密安排下陆续到达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22日，民革代表李济深、谭平山等，同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月27日，民革又单独发表《对于时局声明》，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2月3日，李济深致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民革的声明和行动充分表明，民革自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同中共合作的历史道路。

1949年9月21日—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其中，出席会议的民革、民联、民促代表和候补代表共39人，其中民革正式代表16人。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宋庆龄、李济深当选为副主席。何香凝、李锡九、蔡廷锴、陈铭枢、谭平山、柳亚子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谭平山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朱学范为邮电部部长，何香凝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员，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的制定及其他建立新中国的各项活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多党合作制度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1月12日—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同时宣告结束。

民主党派与民主建国道路

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现实意义
『茶叶之路』：

□董恒宇

“茶叶之路”是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万里商道，距今有300多年历史了。同有2000多年历史，尽人皆知的“丝绸之路”相比，“茶叶之路”较少人知道。“茶叶之路”绵延1.3万公里，途经中、蒙、俄的200多座城市。当年，“旅蒙俄商”从南方福建、两湖等地采购茶叶汇集到归化（今呼和浩特）、多伦，然后以骆驼为运输工具，途经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或经包头、经棚、赤峰等地，最终到达莫斯科、圣彼得堡及东欧各国。这条活跃了300多年的国际商道，在地球的北部镌刻了一条条深深的商贾文脉。然而，在当代人的记忆里，“茶叶之路”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至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都找不到它的痕迹。查阅新出版的《新全球史》，此书洋洋洒洒上千页，突出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在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却只字未提横跨欧亚大陆的“茶叶之路”。“茶叶之路”似乎已被历史的尘埃掩埋。

“茶叶之路”的文化意义

拂去历史的尘埃，探寻300多年前的真相，当我们以文化探索的姿态走进“茶叶之路”时，首先的疑问是：茶叶的力量真的能开通一条横跨欧亚万里商道吗？在这条道路上曾经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叶是中华农耕文明的精品。茶树经过“叶绿素”转换，将太阳能直接转化为人类生命的绿色能源。欧洲人的祖先与蒙古人一样，都是“牧羊人”，都以食肉为主，都有饮茶的传统。食肉为主的人群通过大量饮茶才能得到维持生命的绿色能量。所以，茶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饮品。至今欧洲人依然保留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邓久刚先生的《茶叶之路——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一书所说“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美国作家艾梅霞的著作也提到“我的蒙古朋友有父母去世，下葬的时候总是在头下枕一块茶叶”的丧葬习俗，都源于这种生命的渴求。

茶叶代表着绿色，代表着阳光，代表着文明，代表着生命。茶叶占有人类“饮料之王”的地位，如同围棋是“游戏之王”、太极拳是“竞技之王”一样，都经过了几千年以来人类文明的“自然选择”。

在“茶叶之路”的古道上，与茶叶一起输出的还有用蚕丝织成的绸缎、用棉花纺成的布匹，它们都是纯天然的绿色产品，而且携带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气息。通过“茶叶之路”，中国人把绿色文明输往俄国，然后扩展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古老的中华民族总是以和平方式输出文明，“丝绸之路”如此，“郑和下西洋”如此，“茶叶之路”又一次印证了这一点。“茶叶之路”是中华文明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国际贸易史的一段佳话。深入研究“茶叶之路”会发掘它的考古学、历史学等文化意义。这条古老的“茶叶之路”也称草原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是连接贯通东西文化交流的“动脉”，是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民族文化风格的汇合地，承载着东西文化相互传播的伟大使命。

“茶叶之路”的政治意义

茶叶之路开通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前后。这一条约是沙皇俄国与清王朝签订的，其重要意义在于从此顺利展开了中俄两国的边境贸易。

《晋中地区志》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太谷、祁县、榆次的旅蒙及旅俄商人中以骆驼和车辆作运输工具的‘驼帮’和‘车帮’开始出现。穿越蒙古高原，将福建、两湖的茶叶、丝绸运往俄国及东欧各国。”

“旅蒙俄商”驼队在蒙古高原广袤的荒野上，在西伯利亚寒冷的大地上，踏出了一条条道路，载着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布匹的庞大驼队从草原走过，运银锭的牛车和官方派出的外交使团的身影从草原经过，强盗们的暗影像幽灵似的闪过……俄罗斯商人、中国商人、阿拉伯商人，官方的、私家的商行，各种各样的角色竞相登场亮相，在欧亚草原戈壁广袤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生动的历史悲喜剧。

关于草原民族对东西方经济贸易的作用，艾梅霞在她的《茶叶之路》一书里写道：“要理解联结满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茶叶之路以及它们之间的贸易，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清俄之间的草原民族的贡献至关重要。是这些草原民族使得东西方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实体。”踏上历史的“茶叶之路”并非浪漫之旅，这是一条洒满了血泪、堆满了白骨、充满了荆棘的探险之路。旅蒙商、旅俄商们有着儒家诚信厚道的传统精神，也有商人的精明强干与开拓精神，但凭此闯过大草原、大荒漠是不够的，还需要蒙古族、回族等兄弟民族的支持与帮助；有这样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团队，才能在人迹罕至的蛮荒中冲出一条血路。在茶叶之路的万里征途中，众多民族兄弟生死相依、团结一心，战胜荒野中的风沙雨雪，击退草莽中的盗匪猛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和开拓进取的英雄气概；在长达300多年中，在地球的北部、大漠荒野，在异国他乡奏响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凯歌，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全新的内涵，为世界贸易史谱写了宏伟的篇章。

通过“茶叶之路”，中俄之间进行贸易交往300多年，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发展，增进了彼此的互相了解；旅蒙俄商们在俄蒙地区经济建设方面的历史意义，也早已被所在地方的人民所认识。

“茶叶之路”和旅蒙俄商现象的经济意义

横跨欧亚的“茶叶之路”所经历的漫长历史，几乎可以与大清王朝的兴衰史叠印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个经济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股份制”是西方人的专利，而事实上300多年前以大盛魁为代表的国际商贸集团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外向型民营股份合作制企业，而且旅蒙俄商们的企业制度不是向西方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其中“人合性”与“资合性”的结合是极为巧妙的，而且是以“人合性”为主，“资合性”为附，因而更具凝聚力。其中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是他们对“商誉”和“信用”的珍惜达到了甚于生命的程度。例如，由大盛魁出资设立的小企业绝不允许用“大盛魁”的商号，而须另起一名，因为这些小企业有上百家，一旦某家小号亏损甚至倒闭，并不影响总号的商誉。其内部管理极为严格，企业规章十分健全，透视出可贵的现代性、科学性。还有，对人才的重视和严格用人制度也是其成功制胜的法宝。旅蒙俄商们创造了最早的“期权制”（身股），即员工在企业的股份随着其工龄和贡献在增长，都记在“公积金”里，一旦辞职或跳槽，身股便化为乌有，期权制把员工的命运与企业绑在了一起。现代企业家们至今还在苦苦探索的制度建设和管理方式，旅蒙俄商们在300多年前已经应用自如了。

旅蒙俄商们能够积累起巨额资本，靠的是庞大的“公积金”——依托“公积金”他们建立起自己的金融体系，即钱庄、票号和典当等，保证了金融资本的周转、调拨和汇兑等资本运作可以做到“如鱼得水”；有了庞大的资金支持，其所从事的行业除茶叶和金融外还包括毛皮、牲畜、服务业、运输业、绸缎庄、瓷器等等，无所不包。

“商业造就城邦。”“茶叶之路”的繁荣，极大地刺激了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大批城镇在它的影响下萌芽、发育、成长。这批城镇以呼和浩特和包头为中心，在其两翼铺展开的有：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定远营、河口镇、集宁、丰镇、隆盛庄、多伦、张家口、小库伦、海拉尔和牙克石、满洲里。比如“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是迄今为止仍然在包头广泛流传的民谚。在“茶叶之路”催生下，由旅蒙俄商与各民族共同培育起来的一批商城，在当时几乎是“平地冒出的城市”。

环球史话